

钟甫宁卷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五、六届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联合国世界粮食安全与营养委员会高级专家
南京农业大学钟山学者特聘教授

.....
钟甫宁 著



江苏社科名家文库

江苏人民出版社

钟甫宁卷

钟甫宁 著



江苏社科名家文库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苏社科名家文库. 钟甫宁卷/钟甫宁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214-19300-1

I. ①江… II. ①钟…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②农业经济—文集 IV. ①C53②F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48766 号

书 名 江苏社科名家文库·钟甫宁卷

著 者 钟甫宁

责任编辑 张 凉

责任编辑 王列丹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4 插页 4

字 数 38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19300-1

定 价 60.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以更多的学术名家名品引领和推进 江苏社科强省建设

厉以宁

《江苏社科名家文库》(以下简称《文库》)收集的成果是由 10 位“江苏社科名家”完成的,涉及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这些成果展现出几个方面的鲜明特色。

开阔的学术视野。从时间维度看,《文库》的内容贯穿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各个发展阶段,是历史与现实相对接的思维,是对经济社会热点问题的深邃思考,也是对 30 多年来的体制转型与发展转型实践的理论提炼。从空间维度看,《文库》成果从不发达区域到发达区域、从省内到省外、从国内到国外,全方位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理论阐释和实证分析,其中既有区域研究的战略思考、地域特色的人文探讨,也有江苏发展的实践总结、学术前沿的讨论争鸣。

独有的思维张力。《文库》的 10 位作者分别对多学科的众多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成果中既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阐释,也有让人十分叹服的实践分析。

质朴的行文风格。细细浏览之后,感到《文库》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引用经典而不晦涩,系统阐述但不乏味。作者们的行文没

有从概念到概念的推演,更没有“要如何如何”的说教,而是用叙述取代推演,用事实取代空议,寓理论于事件、故事之中,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表述方式接地气,用语质朴亲切。阅读《文库》,犹如在听作者讲见闻、讲故事,在轻松有趣的交流中了解深刻的社会科学道理。

《文库》是江苏社科发展的缩影。与《文库》的光芒相辉映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不断拓展。

一是涌现出一大批有创见、有价值的理论精品,创出了具有江苏特色的社科品牌。社会科学界的专家和学者们以极大的热情,坚持与时代同进步、与实践共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重要阶段,都始终站在时代潮头,以不畏艰难、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探索、发现中华历史文化的精髓和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在各自长期从事的专业研究领域形成了独特的学术体系和学术观点,推出了一批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不仅在江苏甚至在全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上个世纪80年代由匡亚明发起主编、共200部6000万字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成为我国影响重大的原创性思想文化项目;由全省160多名社科专家编撰的14卷本430多万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丛书》,是目前国内第一套全面研究和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范畴的系列研究著作,得到全国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二是致力于研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改革开放之初,以胡福明为代表的一批社科工作者,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积极参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与束缚,推动全民族思想大解放,开启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的历史新时期,发挥了应有作用。在经济建设大潮中,江苏一批经济学人,在提炼“苏南模式”、总结园区发展经验、完善创新驱动战略、优化全面小康和基本现代化建设目标内涵等方面,先

后出版了近百部专著,发表了近千篇论文,提出了近万条决策咨询建议,为江苏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撑。为了更好地担负起决策咨询的重任,成立于1997年的“江苏发展高层论坛”已连续举办33次,先后有五任省委书记在论坛活动中向500余位专家学者问计。

《文库》的鲜明特点和江苏社科界取得的相应成就决定了它的出版至少具有两方面的价值。

首先,有助于促进江苏社科人才队伍建设。系统推出10位名家的个人专集,从一个侧面展示江苏深厚、丰富的社科研究底蕴,反映江苏社科界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解放思想、创新理论的探索历程,彰显江苏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不断发展和壮大的辉煌成就,打造江苏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原和高峰,传播江苏学人丰硕的研究成果、严谨的治学态度、鲜明的学术个性和德学双馨的人格魅力。这是对江苏社科强省建设成果的最好展示,是对江苏社科名家影响力的再宣传、再放大,必将有助于增强广大社科工作者的荣誉感和使命感,从而有助于促进江苏社科人才队伍建设。

其次,有助于引导和激励江苏社科工作者更积极地投身于“迈上新台阶、建设新江苏”的伟大实践。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2月在江苏视察指导工作时殷切希望江苏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紧紧围绕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光荣使命,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努力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实现习总书记为江苏发展明确的新坐标和新任务,迫切需要广大社科工作者对人民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和理论升华,以便更好地指导和引领新的发展实践。《文库》的出版,将进一步发挥江苏社科名家对整个江苏社科

界的引领、示范和激励作用,从而增强江苏广大社科工作者的责任心和主动性,促使他们更加积极地投身于“迈上新台阶、建设新江苏”的伟大实践。

我是江苏仪征人,1948年毕业于南京金陵中学高中部。我在这里衷心地向故乡的杰出学者们致敬,希望他们在各自专长的领域内做出新成绩。

(2015年5月27日)

目 录

学术小传

快乐年头打下基础	002
艰苦岁月缓慢积累	009
幸运时代广泛吸收	020
承上启下薪火传承	033
理论引导实证研究	038

代表性学术成果

一、一般经济学	054
GDP 统计的若干理论和实践问题	054
宪政经济学:一个应当科学对待的研究领域	063
中国在耗竭世界资源吗 ——兼论可持续发展问题	071
二、比较优势与农业结构调整	079
结构调整在我国农业增长中的作用	079
用国内资源成本测定比较优势的缺陷及其纠正方法	084
中国种植业战略性结构调整的原则和模拟结果	090
三、农业保险	100
影响农户购买农业保险决策因素的实证分析	

——以新疆玛纳斯河流域为例	100
粮食生产与风险区划研究	110
农业保险与农用化学品施用关系研究	
——对新疆玛纳斯河流域农户的经验分析	118
对农业保险补贴的福利经济学分析	138
福利损失、收入分配与强制保险	
——不同农业保险参与方式的实证研究	150
四、粮食安全	172
我国粮食储备规模的变动及其对供应和价格的影响	172
粮食储备和价格控制能否稳定粮食市场?	
——世界粮食危机的若干启示	182
正确认识粮食安全和农业劳动力成本问题	193
五、农村劳动力与人口	204
我国能养活多少农民?	
——21 世纪中国的“三农”问题	204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压力究竟有多大	
——一个未来城乡人口适当比例的模型及分析框架	212
我国农村人口年龄结构的地区比较及政策涵义	
——基于江苏、安徽、河南、湖南和四川的调查	220
六、土地产权与流动	232
土地细碎化与农用地流转市场	232
现阶段农地流转市场能减轻土地细碎化程度吗?	
——来自江苏兴化和黑龙江宾县的初步证据	241
七、农民收入与社会保障	258
中国农村贫困的变化与扶贫政策取向	258
农民角色分化与农业补贴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	
——江苏省农业税减免、粮食直补收入分配效应的实证研究	268
农业发展、劳动力转移与农村贫困状态的变化	
——分地区研究	281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不同补偿模式的收入分配效应	
——基于江苏、安徽两省 30 县 1500 个农户的实证分析	296
八、农户生产决策	311
农地细碎化、劳动力利用与农民收入	
——基于江苏省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实证研究	311
土地产权、非农就业机会与农户农业生产投资	322
农户种植业决策中的外部性研究	337
实际价格、粮食可获性与农业生产决策	
——基于农户模型的分析框架和实证检验	348
我国农户农机需求及其结构研究	
——基于省级层面数据的探讨	356
学术年谱	370
后记	374

学术小传

1951年5月17日,我出生于南京市,祖籍广东梅县(已改称梅州市),但至今未回去过。除了口味清淡以外,身上看不到多少客家人血统的痕迹。不仅插队和求学没有换过地方,留学归国任教27年也没有跳过槽或换过岗位,看来“惰性气体”的自嘲可以维持到退休乃至生命的尽头。不过,尽管个人是“惰性气体”,但60多年来的社会变化却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个人的进退沉浮基本由社会变迁主宰。个人的天赋和努力也很重要,但最终结果却要看个人的天赋和努力是否与社会发展的方向一致。回首往事,确实值得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特别是作为教师,给众多学生留下心得体会更是一种义务。但“惰性气体”的本质导致无限期的拖延,《江苏社科名家文库》的编撰给我施加了外部的推动力,总算有理由强迫自己做这项工作了。

快乐年头打下基础

与儿孙辈相比,我们这一代人的少年时代不仅物质匮乏,而且父母也没有多少时间可以陪伴,但生活仍然是快乐的。我们没有令人眼花缭乱的电子玩具、遥控玩具和益智玩具,丢沙袋、拍洋画、打弹子、挑梭也可以让我们乐此不疲;没有ipad、kindle和电脑,反而让我们更乐于读书和人际交流,更乐于走向户外。课间休息时,我们可以在操场上滚橡皮圈或铁圈,玩官兵捉强盗或攻城,哪怕是简单的斗鸡子或“挤油挤油渣渣”也能让我们打成一团、乐不可支;放学后或假日里,我们可以结伴打康乐球,到哪一位同学家或公园去玩,炎热的暑假里还可能到中华门外的雨花台甚至更远的菊花台粘知了、捉蚰蚰和金铃子。没有父母和老师的贴身关怀和监督,我们有更多的自由空间和时间用于寻找自己的乐趣。当然,良好的社会治安和交通安全是父母和老师可以放手的重要原因。不过,我们少年时代的自由更多来自没有应试教育的恐怖压力,因而没有过度的恶性竞争,更不用拼上全部空闲时间乃至压缩睡眠时间。没有压力、相当充分的自由不仅给人以快乐的感觉,而且有利于兴趣和爱好的发展,也有利于智力的发展。

我的母亲是小学教师,这也许是我潜移默化接受了学前早教的重要原因。不过,我的记忆中并没有父母提前对我们进行正规教育的印象;提前接受教育的原因更可能来自同辈人的互动影响。同一个大院里居住的亲戚有一个小孩比我大两岁,也比我早两年上小学,记忆中我似乎把一起做作业当做游戏,因而自然而然比同龄人早两年接触小学课程学习内容,也多多少少培养了一些自学的能力。因为当年几乎没有什么学前儿童早教,加上我的“早教”事实上是带有乐趣的游戏,其成果足以让我成为“学霸”,并且乐于将这一领先地位一直保持下去。从1958年进入南京市建邺路小学,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打断我在南京一中的初中学习,8年中小学教育期间的正规课程学习一直轻松愉快,并且有大量的时间可以用于课外阅读和各种有益活动。

记得我从小学低年级就开始阅读长篇小说,阅读面很广,既包括《林海雪原》《上海的早晨》《三家巷》等现代小说,也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等古典名著;当然不会漏掉唐诗、宋词、元曲

和鲁迅、巴金、茅盾等名家的大作，也不会错过《十万个为什么》这样的科普著作和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虽说多年来歧视农村和农业似乎是城市人的通病，而跳出“农门”则是广大农民特别是农村青少年的梦想，我和周围的一些小伙伴似乎没有这样的观念。（也许这样的观念形成于我们少年时代之后？）记得当年我们阅读的科普著作包括一些介绍农业生产知识的通俗读物，其中有一本书中猜想对小麦的根部施加机械刺激可能促进小麦分蘖甚至诱发多穗，这一猜想引起了我们的好奇，说服一位同学的父亲在家中种烟叶的园子里划出一小块供我们“做实验”。很自然，缺乏指导和监督的游戏持续不了多久，“试验”很快就无疾而终，具体时间和原因都无从回忆了。

当年的课外活动丰富多彩，无论是学校、区少年之家还是市少年之家，都有许多课外活动小组，但完全不同于今天的大多数兴趣班。那时的课外活动小组不收费，更没有功利主义的目标，既没有补课性质的语文、数学兴趣班，参加其他各种活动也不会获得中考或高考加分。因此，家长和老师也不干预我们自己的选择。记得我曾经先后参加过建邺区少年之家的中国象棋兴趣班和鼓号队，但时间都不长，大约各1学期；五年级以后参加了手旗队，从此就再也没有改变，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实际上，“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次不知省里还是市里组织长江90华里长游，还把我们手旗队的几位小伙伴召集起来，担任护送船队内部的联络工作。

手旗通讯本来是舰船之间以及舰船与码头、基地之间距离联络的一种实用技术，在我们的课外活动中变成了一种竞技体育运动：两个人一组比赛用手旗收发报的速度和准确性。手旗通讯与无线电收发报差别很大。从发报者的角度看，无线电发报者只需要看着给定的一组字母按顺序发送出去，发任何一个字母的时候都不需要记住后面还有哪些字母、是什么顺序；而发送手旗信号的人必须记住整句报文的文字，在大脑中翻译成字母，然后依次发出。对于收报者来说，无线电收报者一边听一边记，只需要把耳机中听到的字母准确记录下来就行了，而手旗信号的接收者必须在收看手旗信号的同时，把前面已经收到的手旗信号所代表的字母连接成字、词并且记住，整句报文收完以后再完整地写下来。因此，手旗通讯对记忆力特别是短期内的强记忆力要求很高，需要长期的持续锻炼。

当时我们每个星期天都要去玄武湖航海俱乐部训练，寒暑假也经

常去训练。虽然可以报销公交车票,但我们通常都步行,途中顺便练习强记能力:一个人信口说上一串40—50个字的话,另一个人立刻重复出来。经过长期锻炼,通常我们可以在平均每秒钟收发3—4个字母的条件下用10来秒准确完成10多个字的通讯。锻炼记忆力附带的好处是从此再也不必担心语文课上老师抽查课文背诵,课后又省下了大把大把的时间看课外书或者玩。凡是语文课上可能抽查课文背诵时,只要有几秒钟时间,哪怕是起立、敬礼的时间,就足以把课文的第一段看两三遍并牢牢记住;如果老师让别的同学背诵第一段,正好利用这一时间看第二段,一点不误事。当年的小伙伴一致认同参加手旗队的训练可以提高记忆力,不过,我觉得高强度的训练同时还帮助我们提高了集中注意力的能力。短短十几秒或数十秒钟决定胜负的竞赛,容不得哪怕0.1秒的疏忽或大脑突然“短路”,长期的训练大大提高了控制和集中注意力的能力。高度集中注意力的能力不仅提高了记忆力,而且大大提高了思维的敏捷性和反应能力,大脑的工作效率相应大幅度提高。我一直相信我的大脑思维能力终身受益于少年时代手旗通讯活动。

对我来说,参加手旗通讯活动提高的能力远不止于记忆力和注意力,还提高了独立自主的工作能力和组织能力,这在以后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中更重要。在建邺区少年之家手旗队接受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我就在建邺路小学积极推广这项运动(六年级时我是少先队大队长),并且组织了一次全市范围内好几所小学参加的手旗邀请赛,从策划到组织比赛都没有老师的参与,完全由我们自己完成,甚至连邀请信也是自己起草、自己写、自己送上门的(寄信的经费都没有),只是比赛时请航海俱乐部的教员来帮助计时、计分。对于一个六年级小学生来说,这样的自主活动真是一种非常有益的经历。

进入南京一中以后,我联络曾经在建邺区少年之家共同参加过训练的两位同学向大队辅导员提出开展手旗活动的建议,当时的大队辅导员不了解这项活动,并已临产,因而积极性不高,建议无果而终。很快,这位辅导员因生孩子休假,接任的辅导员马双吟老师以前曾经参加过航海俱乐部舢板队训练,对手旗活动有所了解,因而对我们的建议十分支持。有了辅导员的支持,初中几个年级都开展了手旗通讯活动,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除了在航海俱乐部举办的各种比赛中获得许多奖励以外,在正规的全市性综合运动会上也为学校争取到很大荣誉:1965年南京市第十一届运动会将航海通讯列入正式比赛项目,我和一

位同学代表中学联队参赛并获得第二名,另外两位同学代表白下区队参赛并获得第四名。与此同时,我还受航海俱乐部教员的委托,单独或者带领几个同学去其他学校辅导手旗活动,包括花一个多小时乘坐公交车再转乘轮渡过长江,去浦口区少年之家辅导浦口区的中小学教师;并且组织了一次更大规模的全市性邀请赛。从持续时间和实际结果看,手旗通讯活动中获得的各种能力对我后来的求学和教学科研都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从1964年9月进入南京一中到1966年6月初因“文化大革命”爆发而停课,我的中学正规教育持续了不到两年时间;虽然时间不长,但却为以后的深造和教学科研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5年上海有几位高二学生提前参加高考并被大学录取,大概在当年年底,张正予校长就在大会上号召有能力的同学争取通过自学提前进入更高年级的学习,即鼓励跳级,并提出一些具体措施:课堂上可以不听课,在不妨碍其他同学的条件下超前自学;自修课或者课余时间各类实验室开放,提前自学的同学可以申请使用实验室并获得相关教师指导。1965年寒假很忙,南京市体委组织春节慰问活动,我们手旗队也和其他运动队混编在一起每天去郊区演出,只在除夕的下午和年初一的上午休息了两个半天。我利用晚上的时间自学完了初二下学期全部数学课程,积极准备新学期开始后全面自学。当时的一中确实宽松,记得那年各门课的寒假作业我都没做,结果一点事也没有,没有受到任何一个老师的批评。

1966年春季学期开始,我在数学课上自学初三的平面几何,自修课时间自学初三的物理、化学,晚上自修俄语,各门课程的老师都很支持。数学课上,彭乐元老师对我和另一位同学不听讲课自己看书视而不见,只是偶尔提醒一下不要影响其他同学。记得我们曾经有一次离开课堂去外面讨论,也没有受到任何非议。彭老师最有意思的一点是,每堂课结束时在黑板上书写一道思考题,愿意做就做,不愿意做就不做;他不给答案,也不回答提问,不看计算过程和结果,做了以后是错是对只能自己判断。我想,判断错对也是一项重要能力,彭老师的初衷大概就是要我们自己开动脑筋,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平面几何的自学很顺利,到5月中旬停课去农村劳动时已经自学完了初三两学期的课程。物理、化学的自学也还顺利,物理组和化学组的老师很配合,只要我们提出申请,总是及时安排单独实验并给予指导。超前自

学的主要困难在于俄语,无论如何努力,顶多可以超前3—5课,无法超前很多。不过,俄语课堂学习还是很有收获的。教俄语的是我们班主任毕秉钧老师,他采用了一种非常新颖的教学方法,每天挂一幅图画看图讲故事,老师讲完以后请同学讲。通过看图说话的方式学语言更符合客观规律,是一项重大改革,因而每天都有其他老师来听课。我的强记力最好,所以几乎每天毕老师讲完后总是要我先讲,因而得到的锻炼也最多。

俄语自学的进度实在不足以提前一年参加高中入学考试,“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更彻底粉碎了跳级的希望。不过,一中当年的学习环境和半年时间的自学却让我终身受益匪浅,为1977年自学通过“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高考进入大学以及以后的深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中断了正规的学业,但似乎没有完全结束少年时代的“快乐岁月”,客观上也没有完全停止对未来的准备。停课带来的自由提供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可能,也提供了锻炼身体的时间。知识和身体的储备对今后的深造和事业非常重要,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不自暴自弃的心态更重要。

我父亲16岁从广东老家乡村只身来南京求学,从会计学校毕业后恰逢全面抗战爆发,从此加入国民政府军事系统,在军事被服厂和荣军医院等机构从事财会工作。在大后方奔走8年,1945年回到南京后在国防部和联勤总部担任军需官,1949年已经荣升上校,但留在南京,没有跟随国防部机构迁台。1949年以后申请加入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未果,随即因伤寒住院治疗数月,出院后经亲戚介绍到白下区酱品厂担任会计,1965年“四清”运动中被调离会计岗位,到门市部做普通营业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我一下子从少先队大队长变为游离于各种组织之外的“边缘人”,连外出串联也没有任何组织可以开介绍信,直到当年较晚的时候才有机会出去“步行串联”。也许因为年纪小、“少年不知愁滋味”,也许因为过去同学之间关系融洽,没有受到身边同学的歧视。也许因为运动初期父亲单位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不激烈、生活工作照常进行,直到1968年11月插队为止,我并没有感到很大冲击,虽然日常生活已经改变了很多。

说起来也滑稽,“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的目标之一就是批判“封资修”的意识形态,而恰恰是这种批判进一步刺激了少年人的好奇心,停课而又不能参加“红卫兵”组织的活动则提供了大量时间,这两年的

时间里我阅读了大量外国名著。从大、小托尔斯泰到契诃夫、莱蒙托夫、车尔尼雪夫斯基,从罗曼·罗兰到雨果、巴尔扎克、莫泊桑,从莎士比亚到雪莱、狄更斯、伏尼契,从马克·吐温到杰克·伦敦、欧·亨利,狼吞虎咽地阅读所有能找到的世界名著,同时也阅读一些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受政治运动的影响,此时也开始涉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著作。记得1966年1月步行串联到上海以后,看了不到半天的大字报就感到索然无味,以后几天独自坐在上海图书馆阅读《鲁迅全集》,这大概是当时公共图书馆可以很容易找到的唯一可读之书。

除了读书以外,“文化大革命”期间最大的收获就是长期、大量的体育运动。我们班好像“自由电子”特别多,特别是男同学,大多游离在所谓“革命”行动之外,整天在一起打篮球,经常一天打上五六个小时,上下午都在一中的朴园操场上打球。我的个子比较矮,更需要积极跑动才能有资格加入某一边,否则只能在场外当看客,因此运动量可能更大一些。除了和同班同学、邻班同学打球以外,我经常去老同学仇炼渝家“上班”,即除了吃饭睡觉以外上下午都去。仇炼渝是上小学之前就认识的老邻居,以后小学同班中学同校,是真正的“发小”,加上仇炼渝的二哥仇炼衡(南师附中高一学生,年龄与我们相近)和同院居住的小学同学王同虎,四个人可以一道做很多事。除了严冬以外,大半年时间我们每天早晨天不亮起床,先在院子里用井水冲冷水澡,然后做操(毛泽东青年时代以“二十八划生”为笔名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自编的体操),接着长跑,从建邺路跑到鼓楼再跑回头,回来后再做哑铃操、打太极拳。下午从建邺路步行到节制闸,从节制闸游到雨花桥再游回头,以后继续横渡几个来回,尽兴以后再步行回家。此外,下雨天的“雨浴”、刮风天的“风浴”,努力实践“野蛮其体魄”,为“文明其精神”做物质准备。

除了在一起读书以外,白天我们经常在一起打桥牌。本来我们都不会打桥牌,不知谁找到一本《桥牌谱》,四个人正好凑一桌,从叫牌到出牌摸索着学习,以后居然也能像模像样地打起来。插队近10年时间,我教会周围同学打桥牌,经常有机会消遣;在海外留学时,更是每逢周末必打通宵,比较固定的牌友包括北京师范大学的桥牌队教练、清华大学桥牌协会会员(一位“文化大革命”前老讲师)和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桥牌比赛第三名,我这个野路子“山寨”牌手也能跻身一桌而不受嫌弃,可见当年的努力没有虚掷。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当年学习过程可